

## 魏晋文士人格的裂变到合一

孙晓莉

心理学家英克萊斯和勒文森曾指出：“人格结构的相似性的发展，在维系一个社会的稳定功能是有必要的。这些共同的特征使得个人正好稳稳地‘嵌入’整个文化型态里，从社会中找到满足和安全感”。<sup>①</sup>值得指出的是，人格发展模式的趋同性，恰恰表现在其裂变和合一的过程中。在相对稳定的社会里，人格的认同成了一种自然的归属，只有在思想剧烈分化，呈现纷繁复杂的不稳定状态中，我们才能寻出人发展的某种轨迹。这种人格结构的发展，又与整个社会文化型态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带着这种眼光，综观整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本文中称之为“文士”）的人格演变，那么魏晋文士无疑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热点。汉至魏晋，正是中国文士人格由统一到两分，再趋向于新的合一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正是中国古代文士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期。

这可从他们的思想、行为、情绪方面来考察。

思想上，这时期的文士已突破传统儒家思想束缚，吸收道家思想，并且开始研习东汉末传入我国的佛教。建安文学代表作家曹植具有强烈的建功立业思想和儒家忠孝观念，但他也向往道家极乐世界，尤其在他后期不得志时，道家思想更成为他自慰的精神支柱，他在屡屡上书求试，以满足自己“戮力上国，流金石之功”（《求自试表》）愿望的同时，也写下大量游仙诗，希冀自己“逍遥八弦外，游目历遐荒”。他的思想是分裂的，带有强烈的激情和无可奈何的沉重的叹喟。对佛经，据《广弘明集》记载“植每读佛经，辄流连嗟玩，以为至道之宗极也”，由此可见，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佛家思想影响的。如果说建安时代以曹植为代表的文士儒家思想仍占上风的话，那么魏末则是道家思想占上风。随着魏代政权不断更替，社会越来越黑暗，文士们纷纷逃避世事，兴起玄学，清淡风气大开。所谓玄学，玄者玄远，宅心玄远则必然主张超乎世俗，不可物务营心，因而他们对儒家思想持

否定态度，尤其反对儒家的礼教——名教，这批文士每每标榜自己是“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然而他们并未忘怀世事，他们对周孔每每非难，其实也正是内心并未忘怀物务的反映。《晋书·阮籍传》记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可见他并非生来玄远，而是时代使之然，以阮籍为代表的文士把内心深处的儒家思想掩盖起来，而以否定一切儒家思想的态度出现，然究其实质，他们反对得越强烈，内心矛盾冲突就越大。同样，《晋书·嵇康传》评嵇康为“性烈而才隽”，这种性格决不能做到“宅心玄远”，事实也是如此，嵇康最终因政治小集团的失败和他作为魏宗室成员而遭到株连，死于非命，阮籍一生以“口不臧否人物”而得到善终，但其精神上是郁郁寡欢的。他们对名教的抨击，不过是对当时虚伪名教的不满，鲁迅先生概括得颇为精辟：“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了”。<sup>②</sup>

他们人格的二分，使其思想充满了愤世嫉俗的成份。晋末陶渊明，更是徘徊于儒、道、佛的矛盾中。他一生始终诵读儒家经典，恪守“先师遗训”曾数次出仕，出入于用世与入世之间。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这三仕三出，在他看来是与本性相违的缘故，“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载”（《归田园居》）只不过因自己贫穷，不得不为官。如果说后期他能忍受“寒馁常糟糠”（《杂诗》）的生活而坚决不做官，那么他稍优越生活状况的前期，决不至于非为官不可，可以这么说，这些只不过是遁词，真正的原因倒是儒家的用世思想始终萦绕着他，使他欲出仕不忍。他《杂诗》中

①（美）普汝著，郑慧玲译《人格心理学》，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75年1月版。

②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倒是他少壮时心态的反映。而他屡屡出仕和最终归隐田园，却是深受道家出世思想影响。他在《饮酒》诗中说：“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他所论“真”、“淳”都来自道家抱朴还真的观念。他的“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的美学思想，更是对道家美学精神直接继承。尽管他在《饮酒》二十中指责不信奉儒家思想之人为“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但这并不妨碍他与方外之士的交往，他与“莲宗初祖”慧远来往甚密，成为当时不入教的莲社三贤之一，他的诗文屡屡出现“乐天委命，以致百年”（《自祭文》），“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辞》）的佛家思想成份。而在《莲社高贤传》则有陶渊明不入莲社，“忽辍眉而去”的记录。可见，他只不过是接受佛教某些思想成份，而并非佛教仪式和整个思想。他对儒、道、佛三教都是兼收并蓄，合理吸收，并加以利用，这也是形成他恬淡和宁静的性格的主要因素。陶渊明《形影神》一诗，可以看出三教在他思想中矛盾和斗争。“形”具有老庄悲观主义色彩，“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凄。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于是采取“得酒苟莫辞”的生活态度，游戏人生，放纵自我。“影”则带有儒家立善遗名的思想，即“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可不自竭，”认为游戏人生比立善遗名低劣，主张留身后名。而“神”的形象，则具有佛教色彩，认为游戏人生和立善遗名都很难做到，便主张“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即委顺天命。可以这么说，面对着动荡的社会，陶渊明只好饮酒自乐，聊以麻醉自己，而儒家入世的思想总萦绕着他，于是他便以佛家一切归之于天命聊作安慰。综观他的一生，是在三教矛盾中求生存，他最终退隐田园，既接受儒家乐贫思想，也多少接受了佛家委顺天命的思想。也就是说，他的思想已由分裂趋向于合一。许学夷曾指出：“晋人贵玄虚，尚黄老，故其言皆放诞无实，陶靖节见趣虽亦老子，而其诗无玄虚放诞之语，中如：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皆达人超世见理安分之言，非玄虚放诞者比也。”<sup>①</sup>这段话中许学夷已指明了陶渊思想中道家成份外的中和成份——见理安分，而这种见理安分，实际上是融和儒、佛思想的结果。即在陶渊明思想中，三教之间的矛盾冲突已趋向缓解，他的任真自然乃融合三教后的外在表现，他澹淡的性格和平淡的诗文风格，都源于此。而他这种人格的合一，为后世文人

力求心境平和作出榜样。

在行为上，与汉代文士们必须以“德”修身理家治国平天下不同，魏晋文士在行为上表现了任真，即任己真性情流露，曹植诸人，过着“美酒斗三千”，尽情地给社宴饮，遨游，表现出豪放的气概。他们在追求功名同时，注重自我的解放和及时行乐，具有人性回归的色彩。魏末阮、嵇诸人，则在行为上表现出疏狂的特征，他们饮酒酣醉，放荡不羁，《晋书·阮籍传》记载：“当其得意，忽忘形骸，”表现出与礼教彻底决裂的精神，这些行为，都是他们人格分裂，极端矛盾痛苦下的具体表现。晋末陶公，亦以饮酒为乐，他的诗篇多以酒命名，但他饮酒时的情绪，甚至即使在难得的狂饮时，都是淡淡的，没有什么金刚怒目式的愤慨，饮酒于他只是一种自遣，并且在饮酒时，表达“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的志向。他后期心境趋于平和，因而他在行动上以躬耕自娱，以饮酒自遣。

在情绪上，汉代文士始终是高昂的，充满进取精神的，坚信立不朽之名。汉末魏晋，文士情绪则转向低潮，即使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曾经叱咤一时，发出“日月以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观沧海》）的吞吐天地宇宙万物的感慨，但有时也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的低吟。曾处帝王三尊的曹丕，政治上可谓顺利，但是他的诗文格调是凄清的，如“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燕歌行》）。因而建安时代的慷慨多气，更多地带有一种沉重的悲哀之美。阮、嵇诸公，情绪则由低沉，转为亢愤，这种亢愤是在对现实强烈不满时，发泄内心不平之气的怨恨。而陶渊明，则更多地表现出“静穆”的情绪，这种情绪，包含了见惯“乱”以后的沉默和淡泊。

魏晋这个时代，在历史上仅延续了三百多年，较之汉代不可谓长，但文士们的人格却经历了如此大的演变，实在是时代使之然。如果说汉代文士由于长期政权统一，历史积淀而形成了文士的群体意识和儒家思想为主的人格的话，那么由于汉末魏晋时代的动荡，文士的人格产生分裂，形成矛盾，随着矛盾分裂尖锐化，渐渐又趋向整合。具体地说造成这种由裂变到合一的原因，是社会思潮的影响和文士自身的因素。

魏晋时代是动乱社会，需要有识之士的拯救和

<sup>①</sup> 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六。

治理，为适应政治需要，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显露出重才轻德的倾向。魏刘劭《人物志》在理论上已显露出重才智的倾向，把人分为“偏至之才”和“兼才之人”，即指出才与性可离可合，离则为“偏至”，合则为“兼才”，尽管仍重视才性结合，但把才提高到很重要的地位。刘子则指出：“或问曰：士或明哲穷理，或志行纯笃，二者不可兼，圣人将何取？对曰：其明哲乎！夫明哲之为用也，乃能殷民阜利，使万物无不尽其极者也。圣人之可及，非徒空行也，智也”（《中论·智行篇》）。明确地指出在才与性不可兼得时，才重于性，并把“才”提高到利国利民的地位，明显地有重于德倾向。这样，魏晋文士们可以在建功立业的同时，宴饮享乐，儒家的人世与道家出世是并行不悖的，与儒家传统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是有极大分别，以至于形成文士放浪不羁的个性。这种“才性之争”，为人格分裂奠定思想基础。

人格的分裂毕竟是痛苦的，遗忘世事毕竟是不易的，因而，如何寻找一种契机，摆脱这种分裂，便成为必要，在这点上，佛教的“适性”、“自得”迎合了这种需要。而思想上，道佛教也逐渐向儒教靠拢，为文士人格分裂到合一提供了可能。魏源在分析老庄及魏晋之士的异同时说：“老子言绝仁弃义，而不忍不敢，意未尝不行其间。庄子乃以徜徉玩世，薄势利逐河帝王，厌礼法则盗圣人，至于魏晋之士，其无欲又不及周，”<sup>①</sup>在这里，魏源认为魏晋文士的道家思想成份，比徜徉玩世的老庄思想，是多了一份功利，多了一份入世思想的。也

就是说，道家思想在魏晋文士思想中染上了一定的功利色彩的儒家思想。至于说佛教，渐渐与道家思想合流，在人生虚无上，二者越来越趋向一致。

尤其在东晋，慧远等佛家大师提出：“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淡耳；以今观之，便悟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苟会之有宗，则百家同致”（《与隐士刘遗民书》），这段话，至少说明两点，一是中国本土生长的佛教徒，曾受佛道教育，在思想深处，总蒙上儒、道影子；二是东晋佛教领袖，力求使佛教与儒、道结合，这样就带有三教合流的要求和趋向。也就是佛教转而同中国传统政治观念结合起来，为文士们所吸收，在这一点上，陶渊明先声夺人，融三教于一体，率先完成了人格由分裂到合一的过程。而一般魏晋文士，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水准”，他们大抵停留在三教纷争的阶段，尽管在这些人身上也表现出一些合一的趋向和萌芽。

文士人格分裂到合一的内因则是自身人的意识的觉醒，他们从汉代统一的经学模式中解放出来，冲破传统儒家思想樊笼，魏晋文士一反两汉“天人合一”理论，把人生理论的支点，从“天上”移到“人间”，把人生“为君”变成人生“为己”。汉末《古诗十九首》流露的及时行乐的思想，到魏晋已交汇演奏成时代主旋律。这样，人们才能接受不同思想，并在人格上体现出来。没有人自身的解放，人格分裂和合一是不可能的。

① 魏源《论老子》，《诸子集成·老子集》。

（上接147页）

可是“知识”从不曾对他们展开  
它世代积累而琳琅满目的书卷；

“贫寒”压制了他们高贵的襟怀，  
冻结了他们从灵府涌出的流泉。

诗人认为已经葬身九泉之下的尸骨曾经可能是帝王、音乐家、克伦威尔、弥尔顿，但他们所得到的平等都是越过死亡、涉过忘川、在上帝面前的平等，这当然是感伤诗人的强烈的宗教色彩在生命底片上的曝光，但我们不能不曲折地注意到这种平等意识在资产阶级新贵和贵族上层携手共事的社会背景下所放散的感性光辉，它使人在哲学意义上得到了最终的和解：人不是被控制和控制者的二律背反

的组合，它应该是自由和平等相处的族类，它在现实世界也应该如此。

由于感伤诗人的平等意识受到现实社会的摧残，因而他们只能自怨自艾，诗的社会功能显得十分微弱。这，便是引起众多文学史家的不满和冷遇的直接原因。

我们对感伤诗的主体意识、怜悯意识和平等意识的简略分析，在排除了诗的社会功能意义的表现之后，得到了诗的审美意识的一个发现，它对于理性原则是一个反拨，却又是对人本主义的一次更深层的还原：普通人即凡人的审美发现。